

新刊隋唐碑志俗字考

何山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要:出土碑志材料真实、内容广泛、数量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准确释读、科学整理是有效利用碑志材料的关键;难点在于文字俗讹多变不易分辨,铭文残缺模糊不易识断,语言典雅深沉不易理解。考释新刊隋唐碑志俗字疑难字需要抉发俗变原因,梳理形变脉络,沟通字际关系,分析构形理据,融贯变异规律,运用有效辨识方法。

关键词:新刊布碑志文;俗字;考释;隋唐;汉字史

中图分类号:H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5-0088-07

出土碑志材料原始、内容广泛、真实性强、数量丰富、产生时地基本清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史、语言文学、文字学等学科领域研究价值非常突出,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准确释读、科学整理碑志材料是利用这批文献从事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提。古代碑石距今久远,石面风化剥蚀、铭文残缺模糊几成常态;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参杂古今构字成分,石刻文字形体复杂多变、俗讹满目,堪称石刻异体字的两个高峰时期;碑志语言典雅深沉,常堆砌典故特别是使用生僻典故,阅读和理解比较困难。这些因素成为正确释读碑铭的主要障碍。不论是古书录文还是新近刊布的石刻文本,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文字误、衍、缺、脱和标点错乱问题。下面择取文博期刊新近刊布的几种隋唐碑志,就其中的5个疑难俗字进行考释,抉发俗变原因,梳理形变脉络,沟通字际关系,分析构形理据,融贯变异规律,总结辨识方法,希望能为新碑志文献的研究和利用提供帮助,为石刻俗讹字释读考辨和汉语汉字史研究提供参考。

一、新刊隋唐碑志俗字举隅

1. 释“𨾏”

唐长寿二年《阎识微妻裴氏墓志》:“即启西阶之殡,鱼轩𨾏轍,将归北郭之田。”拓本“𨾏”《文

收稿日期:2015-03-29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项目“宋辽金元墓志复音词研究”(2012YBWX08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宋辽金元墓志篆注”(11YJC870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SWU1309208)

作者简介:何山(1973-),男,四川仪陇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碑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①文中汉魏六朝时期的碑刻字形均取自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

物》简报^[1]释文作“从”，即繁体“從”。考查碑刻“從”字形体，其右上构件常写作“𠂔”，基本无例外。如北齐河清三年《狄湛墓志》：“永熙西蹈，公被勒侍從，随到咸阳。”^[2]^[1]拓本“從”即“從”字，通作“從”。右下构件变异，北魏正始元年《山公寺碑颂》作“𠂔”，北魏正始四年《元思墓志》作“𠂔”，北魏神龟三年《常袭妻崔氏墓记》作“從”。而裴志中“從”字右上构件作“𠂔”，与“𠂔”明显不同，中间多一竖笔，因此整字非“从”字，而是“徙”字。志文前述裴氏权葬洛阳龙门之原，后启西阶之殡，载之鱼轩，移辙归葬北郭之田。如此则文从字顺，文意清晰，故原释文作“从”误。

“徙”、“從”、“徙”通行体本相似，变异字形区别特征进一步降低，更不易准确分辨，碑文释读时常常误此为彼，造成种种问题。先看一组例子。

误“徙”为“從”。北魏延昌元年《元詮墓志》：“及皇居徙御，诏王以光爵领员外散骑常侍，赍铜虎符。”“徙”为“徙”字异体，《志石文录》卷上作“從”，误。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由代北南迁洛阳，皇居徙御即指此。北魏永安二年《尔朱袭墓志》：“悲天地之长久，痛陵谷之迁徙。”“徙”同“徙”，《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下简称《墓志汇编》）^[3]^[265]作“從”，误。东魏武定八年《源磨耶圻记》：“但恐年岁久远，惧徙陵谷。”“徙”右上稍泐，结合碑文意思可断其为“徙”字，“惧徙陵谷”指担心年岁久远，陵谷变迁。《墓志汇编》^[3]^[381]录作“從”，《金石文字辨异·遇》引文亦作“從”，并误。

误“從”为“徙”。北魏永安元年《元子永墓志》：“王既任允推轂，君徙镇秦岭。”“徙”即“從”字，《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4]^[384]作“徙”，形近而误。君徙镇指志主跟随其叔父河间王出镇秦岭。东汉建宁五年《郾阁颂》：“又驛散关之嶰瀑，徙朝阳之平燥。”“徙”《石墨镌华》录作“徙”；《金石文字辨异·皓》“燥”下引此句，也录“徙”作“徙”，均非是。《两汉记》：“诸家又以下句‘徙’字，误为‘徙’字，原石实是‘徙’字也。”其说可信。

误“徙”为“徙”。北周宣政元年《若干云墓志》：“山飞海涸，陵迁谷徙。”“徙”为“徙”字典型变异形体，陵迁谷徙即“陵谷迁徙”之变式，《中国北周珍贵文物》^[5]^[72]释文作“徙”，误。

误“徙”为“徙”。隋大业十一年《蒋庆墓志》：“后向建安道行兵，擒获凶徒。”“徙”字稍泐，但轮廓清楚可辨，已有录文作“徙”^[6]，但“凶徙”何意，殊不可解。谛视字形，其右上并非为构件“𠂔”，而是构件“土”，则原字应释作“徙”。凶徒，指恶人、坏人，文意顺畅。

误“徙”为“從”。北齐天统三年《宋买等二十二人造像记》：“跂看之徙，乐善妄归。”“徙”当作“徙”的俗字，《金石萃编》^[7]^[卷34]转录作“徙”，其本意是将该字认作“徙”，然文义不可通，误。











可见，“從、徙、徙”各种俗写形式有的形近易混，有的则同形讹混，相互纠扰，导致已有碑刻释文难以正确辨认，出现种种疏误。纵观各自俗变形体，其变化和区别主要集中在字形的右上部分，但构件变异亦表现出规律性。调查发现，“徙”字右上常变异作“𠂔”，“徙”字右上常变异作“𠂔”或“山”，“徙”字右上部基本保持构件“土”不变，除隋《曹植碑》“徙”作“徙”等个别例子外，多数如此。后续碑刻文献整理时，只要把握三者字形变化的基本规律，再结合具体文义，就能有效提高文本释读的准确度。

2. 释“罔”

唐大和二年《宋若昭墓志》：“山东之风，罔或失坠。”“罔”当是“罔”的俗字。《广碑别字·罔字》^[8]^[117]引唐《契苾铭》作“罔”，可证。“罔”同“无”，《尔雅·释言》：“罔，无也。”志文“罔或”即“无或”，表没有、不要之意，与整句志文表义完全契合。

《说文·网部》：“网，庖犧所结绳以渔。从门，下象网交文。”又云：“罔，网或从亡。”表明“网”是初文，“罔”是“网”的重文，《玉篇·网部》：“罔，同网。”《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张罗罔置罟。”胡三省注：“罔与网同，古字通用。”后以“罔”表用绳线编成捕捉动物的器具。如《易·系辞下》：“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再后来为表罗罟之总名，又给“罔”加构件“糸”，产生“網”字。《慧琳音义》卷8“罟

網”注引顾野王曰：“網者，罗罟之总名也。”由此可知，古籍所载“网、罔、網”三者的衍生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即由网→罔→網。随着词义的分化和词性的改变，“罔”亦用作动词、形容词等。宋氏志中的“罔”用作副词。下面重点讨论“罔”字产生的机制和动因。

当“網”字等产生后，替代了“网”字的功能，“网”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很少独立使用，一般作为造字的偏旁参构他字。汉字简化中“网”又被重新起用，替代了原先的“網”字，成为通用简化字，现在仍作为常用字使用，体现出汉字消长替变的历史规律。而“罔”自产生以来就成为常用字，使用较为活跃，且出现多个变体，以追求最简字形为方向和动力。我们以碑刻文字为例，可窥其形体变异之一斑。“罔”隶书作，见东汉永兴元年《乙瑛碑》。东汉熹平二年《杨震墓碑》又省作，省掉构件“网”中的一个“X”符号。北魏延昌四年《山晖墓志》作，再省略的构件“亡”。《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陆德明释文：“罔，本又作冈。”在此基础上，“冈”字中构件“X”或变异作“又”，如北魏正光二年《王僧男墓志》“罔”作，进而又变异作或，分别见西晋太康四年《司马道妻王氏墓志》、西晋永康元年《张朗墓志》。或变异作“人”，如北魏太和十二年《晖福寺碑》“罔”作，与前面唐志中的字同。作构件也类推，《字学三正·体制上·古文异体》^①收“罔”的俗字，其上部与“冈”同形。变异脉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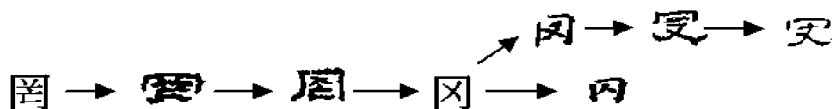
















图1 “罔”字俗变过程

3. 释“虚”

唐大历七年《窈希瓘神道碑》：“虚白有地，还丹无术。”拓本“虚”原有释文^②录作“丘”字，字形不类，恐误。该字上部为构件“虍”的常见变体，因此整字可隶定作“虚”。

小篆有字，“虚”便由篆文楷化而成。《说文·丘部》：“虚，大丘也。昆崙丘谓之昆仑虚。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从丘，虍声。”隶变后，因书写俗讹，“虚”有多个变体。帛书《老子》甲一〇二作，《西陲简》五四·一三作。东汉延熹八年《华山庙碑》作，东汉建和元年《武氏左石室画像题字》作。楷书汉字亦有多个异体。北魏建义元年《元顺墓志》作，北魏永熙三年《昭玄沙门大统令法师墓志》作。作为古文字形的遗留，隶楷书“虚”及相关异体字形都带有隶古特征，今文字直接或间接继承古文字的形体和结构模式，实质上反映出汉字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优化的客观规律。

“虚”下部构件“丘”，甲骨文作（《合》8839）、（《合》4824），《说文·丘部》谓“四方高中央下为丘”，即取山丘之象形。金文《商丘叔簠》作，《齐刀背文》作，块面轮廓线条化，并伴有笔画化特征。碑刻隶楷书字形多承用金文的构形特征，形成新的字群。如东汉延熹八年隶书《华山庙碑》作，建宁元年隶书《杨著墓碑》作；北魏永安二年楷书《元继墓志》作，北魏孝昌二年楷书《于纂墓志》作。作构件也类推。如“虚”，见北魏孝昌元年《元诱墓志》；“虚”，见北魏正光五年《元悦妃冯季华墓志》；“虚”，见北齐武平七年《高润墓志》；三者均可转写作“虚”。由于该字形复现频率高，被社会广泛认可，遂成为通行体，而“虚”则成为其异体。《字汇·虍部》：“虚，俗虚字。”《正字通·虍部》：“虚，与虚同。”北魏太延年间《嵩高灵庙碑》：“唯妄祀岱宗，以勒虚美。”“虚”同“虚”，通作“虚”。虚美，没有根据的虚浮赞美。《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虚美，不隐恶。”北魏太和二十年《姚伯多兄弟造像碑》：“夫大道幽玄，以妙寿为宗，灵教□□，以虚寂为旨。”“虚”为“虚”的俗字，通作“虚”。虚寂，意谓清虚寂灭，为佛、道二教哲学所宣扬的最高境界。

因此，神道碑“虚”应录作“虚”，为“虚”之俗字，不能径作“丘”。“虚白”语出《庄子·人间世》：“虚

室生白，吉祥止止。”谓心中纯净无欲，比喻胸怀澹泊，心灵纯美。至于“丘、虚、虚”之间的音义关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虚篆从丘之意也，丘虚语之转。”其说是也。

4. 释“搯”

隋大业十一年《蒋庆墓志》：“父，搯，为华州司土参军。”拓本“搯”，《中原文物》录作“掺”^[6]，但碑刻人名罕用，恐误。

依字形变异通例，“杲”、“参”二形均常作“叅”或“𣎵”。如“藻”，北魏正光五年《元昭墓志》作“藻”，永安二年《丘哲墓志》作“藻”；“参”，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元弼墓志》作“叅”，正光五年《元崇业墓志》作“叅”。故“搯”既可隶定作“掺”，《说文·手部》：“攴，敛也。从手，参声。”《龙龕手鑑·手部》：“搯，俗掺。”《康熙字典·手部》：“搯，俗掺字。”《汇音宝鉴·甘上上声》收“掺”字，注云：“取也，执也。”《重订直音篇·卷二·手部》：“搯，同掺。”^[7]亦可隶定作“操”，《说文·手部》：“攴，把持也。从手，杲声。”《干禄字书·去声》：“搯操：上俗下正。”但蒋庆父名不能两可，必取其一。据志文，志主讳庆字仲忻，祖讳达，从祖孙人名取字的义理看，其父名“操”更为合宜。再调查碑刻人名，历代名“操”者多之，而名“掺”者未见。如东汉延熹八年《鲜于璜墓碑》：“中子讳操，字仲经。”建安十年《樊敏碑》：“石工刘盛，息操书。”隋开皇十一年《王猛墓志》：“父操，范阳郡开国公。”唐贞观五年《刘节墓志》：“君讳节，字德操，冀州下博人。”唐贞观廿三年《李君绚墓志》：“父土操，安东将军、南兖州刺史。”唐永徽六年《毕正义墓志》：“父操，皇朝滁州刺史。”唐显庆二年《房高墓志》：“君讳高，字操，洛州河南人也。”唐显庆二年《杨操墓志》：“君讳操，字履贞，并州太原人也。”唐上元元年《王义墓志》：“祖操，牟州刺史。”则“搯”为“操”之俗字，而非“掺”字。

由于“掺”、“操”异体形近甚至同形，容易造成混淆，碑文释读时需仔细分辨，以免出错。如北魏熙平元年《元睿墓志》：“植搯立心，率蹈天至。”“搯”，《考古》释作“掺”^[11]，误。植搯，同“植操”，树立志向操守。《文选·桓温〈荐谯元彦表〉》：“窃闻巴西谯秀，植操贞固，抱德肥遯，扬清渭波。”吕延济注：“植，立；操，志也。”再如，东魏兴和二年《敬显儒碑》：“搯节端华，风神雅峻。”搯：同“操”。操节，即“节操”。《金石萃编》卷30作“掺”，非。

5. 释“𡗗”

隋大业十一年《蒋庆墓志》：“呜呼，𡗗土奄若山颓，哲人其逝，轘辘空迴。”拓本“𡗗”可隶定作“拈”，已有释文录作“抔”^[8]，字形差异甚大，且抔土与山颓有失对仗，误。“拈”为何字？要搞清这个问题，先看与之形近的“掬”字，蒋礼鸿先生曾有论述，兹摘引如次。

“掬”应是“掘”的俗体，《说文解字》有“圣”字，解云：“汝颍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音“窟”。大约后人增偏旁作“掬”，而又误作“掬”。《敦煌杂录》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其夜被劫暮（墓）人来墓而入。”意义也是相合的。《龙龕手鑑》上声卷二手部有“掬、掬”二字，无释义，音其月反，正是“掘”的音切。“掬”字的形体和变文相差极微，可为“掬”就是“掘”的参证^[12]。

“拈”当是“掬”、“掬”字的又一变体，同“掘”。则“拈”为挖义，放入墓志铭文中义义通畅，文句对仗。惜字书未收“拈”字，可补。因文字误读，原释文断句亦误，“拈土”应断上，即整句作“呜呼拈土，奄若山颓”。首句铭文以“拈土”、“山颓”喻指人们因志主离世而惊愕悲悼的氛围。与下句“哲人其逝”（“逝”即“逝”字异体），轘辘空迴”紧密衔接。“掘土”出土石刻文献即有用例。南朝宋元嘉十九年《广东始兴南朝宋买地券》：“掘土作冢葬埋，不得使左右比居妄志。”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龚韬买地券》：“于此地中，掘土作冢，藏埋韬尸。”唐长寿三年《伍松超砖地券》：“于中掘土葬埋松超口，共享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钱。”传世文献亦见用例。《齐民要术》卷4：“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太平广记》卷205：“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

至此问题似乎并没有彻底解决。蒋先生据《说文》“圣”字推导“掬”的来源，但“圣”变作“掬”目前

仍未见到实际字例,故“拴”字的形成当另有途径。我们调查汉魏六朝石刻时发现,北魏永熙三年《韩显祖等造塔像记》“概”作“拴”。《龙龕手鑑·木部》:“拴,古文其月反,木入土也,今作概。”《四声篇海·木部》:“拴,音概,榛也。”原来“拴”为“概”的古文。“拴”又为“拴”的省笔俗拴,通作“概”。写本文献中,受书体、笔法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形近构件俗写相混,如手旁字或变易从木,木旁字亦混如手旁,于是从木从手之字同形讹混。如“校”作“校”、“標”作“標”、“檢”作“檢”,又有“擗”作“擗”,“扑”作“扑”等。传抄刻写中“拴”、“拴”字的构件“木”也可讹作“扌”,于是产生异体字“拴”,逆向类推,则“拴”又即“概”的异体字。《逸周书·周祝》:“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獬有蚤而不敢以擗。”朱右曾校释:“擗,掘同。”相对而言,“拴→拴→概→掘”的变化理据更为明确,实现路径更加自然,尤其不论字形还是字际关系和词义都可得到文献验证。这一想法是否得当,期待有识之士提出高见。

二、石刻异俗字考释方法

石刻文献以原石或拓片传世,一般不易被窜改,而且保存着材料的原始状态,比如石花、泐痕等仍因其旧,成为影响释读的载体因素方面的障碍。石上文字经特殊制作转化为纸质拓本,又有精粗之别,同一种石碑的拓本有的完整清晰,有的则文字模糊,内容也未拓全,造成新的释读困难,这些都可视为影响石刻文献整理质量的外因。而碑刻文字繁杂,多不合于六书之法;语言凝重,或奥涩难于理解;此为影响碑文准确释读的内因,也是主因。正是内外双重或多重因素叠加交织,为碑文科学整理和有效利用带来层层障碍。正如叶昌炽《语石》卷十“校释碑文”条云:“校书如几尘落叶,愈埽愈纷。释碑之难,又视校书为倍蓰。墨本模糊,裂纹蚀字,丰碑巨幅,必卷舒而阅之,非如书籍可以按页摩挲。老眼昏灯,愈难谛审。故前人所释之本,往往同一,可是,彼此舛驰。”^[13]克服外因,可选择精拓、完拓,使用高分辨率设备或降低石花干扰的技术工具软件等帮助解决。而处理主因,则需要专门的知识 and 学问,掌握灵活管用的方法,积累一定释读碑文的经验和技能。下面就如何更为准确地研判碑刻异俗字提出浅见,祈请方家指正。

其一,充分了解石刻异俗字的基本状况。总的说来,石刻异俗字非常复杂而繁多,又以汉魏六朝和隋唐为最,几乎每个字都有不同写法,有的字甚至多达几十个,如“爲”、“於”、“靈”等字。把握字形总体特征,需要多看多见每个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拓片或原碑,尽量多阅读俗字比较集中的碑刻材料,如直接阅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刻拓片等,从中体会和掌握字形变异特征和规律,了解文字区别特征的变化情况。造字之初,每个汉字都携带着有别于他字的明显特征,或笔画,或构件,或构件的组合模式,因而字符本不相混,可是六朝以来,石刻文字因俗写讹变,形体逐渐变得近似,甚至完全混同,碑文释读的障碍也由此而大为增加。问题的关键在于,形近或同形的字究竟记录的是哪一个词,最容易产生混淆,不易分辨,必须根据语境理清字词对应关系,才能辨明字际关系,不至于误此为彼,作出错误判断。碑刻著录成果中很多文字问题都是因没有搞清字际、字词对应关系造成的。如北魏延昌四年《王绍墓志》:“照车徒甸,连城去国。”“徒”本为“徙”字异体,《志石文录》却释作“徙”,形近误读。古文“徙”隶变并变异作“徙”,见帛书《老子》乙二〇四下;《睡虎地简》二四一九作徙;“徙”为“徙”的楷书异体字形。元至正八年《从信灵塔铭》:“落发披缁,训诋徙信,每日侍内洒扫,朝暮习诵经文。”拓本“徙”字实即“徙”字异体,《北京元代史迹图志》^[14]误作“徙”。写本文献中常见“徙”、“徙”字的这些变体,不明于此,误判在所难免。

其二,尽量熟悉石刻文字变异的基本规律。尽管石刻异俗字比较杂乱,但并非毫无规律,不可解释,仍然有其变化的规则和原理,值得认真总结。比如字形变异大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通例,慧琳《一切经音义》卷25引唐释云公《大般涅槃经音义序》:“遂使挑挑浑于手木,帐帐乱于心巾,剩草繁于果藟,要点删于写富;修脩兹用,蚀脯夭乖,悟寤同书,解眠翻覆。”^[15]不只是经卷文字部件“扌”和“木”、

“卜”和“巾”、“一”和“宀”等存在互相讹混的现象,石刻文字同样如此。《示儿编》引《字谱总论·讹字说》:“又有偏旁相错者,如爵邑相似,取取相乱,束束不分,奕奕无辨,佳佳通用,月月同体,凡此皆俗书之误也。”不论构件还是整字,石刻文字也经见这些俗讹现象,说明文字书写变异存在共性,带有较强的规律性和共通性,只要熟知写本文献文字形变通例,就可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为辨析俗字提供帮助。如果知晓石刻文字构件“山”和“止”混用这一通例,再结合具体语境,就不会将“從”判作“從”。又如,字形变异有很强的类推性。同样从构件“止”,“歲”又作“歲”,“卸”又作“卸”,“武”又作“武”等;“扌”、“木”相乱除“挑、桃”二字外,还有“扎”和“札”、“摸”和“模”等;“一”、“宀”不分亦见于“冥”和“冥”、“军”和“軍”、“写”和“写”等。这几组字都是异体关系,即每一组字符都记录同一词义,因类推作用,相同构件的同一变体出现在了不同异体字形中。再如,文字形体变异常常体现出一定的序列性,可描述演变的脉络和过程。如构件“止”变作“山”,结合古今字形,其演变过程大致为:𠄎→𠄎→止→止→山。“從”右下构件从古至今形变情况为:𠄎→𠄎→𠄎→𠄎→𠄎→𠄎→之。

“從”字等的构字理据发生根本改变,难于以形索义,如不熟悉形变规律,难以准确建立俗体与通行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碑志文整理易将其误读。反之,只要我们全面清理包括古文字在内的各种字形材料,综合分析,推导整理出形体演变关系,从而达到溯源的目的,还原字形理据,给每个异体字形定点定位,就可解决字形来源问题,文字释读也就可迎刃而解,还可为建立科学的汉字系统和汉字史研究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其三,注意辨识石刻文字变异的特例。除形变通例外,石刻文字亦有不少变异特例,即有些字形只出现于某一种或几种石刻文中,其他材料暂时还未见到,因此考辨中难以找到相关文献进行验证,这就需要更强的研判能力,并着眼汉字发展史进行全面系统考查。如“兒”为“貌”的古文。《说文·兒部》:“兒,頌仪也。从人,白象人面形。籀文兒从豹省。”出土碑刻材料中“兒”有多个变体,常见的为“兒”、“兒”、“兒”、“兒”等。北齐武平五年《口忝墓志》:“其子楷,字难。风流冠辈,瓌皇超伦。”“皇”已有释文作“皇”^[6],但“瓌皇”不词,于文义也难通,误。其实该字为“兒”字,通作“貌”。“瓌”同“瑰”,瓌貌意指形貌魁伟美好,因字形与“皇”近似而误释。由于“皇”不常见,经我们考查处于字形演变系统的边沿^[7],故《汉语大字典》卷四第2647页虽有收录,但仅照抄旧字书,具体为何字仍旧不明。《字汇补·白部》:“皇,如支切,音兒。见《金镜》。”《金镜》不明“皇”为兒的俗字,误以为是“兒”字,注音随之也错,《大字典》沿误其错。特殊字形比较罕见,说明社会使用面小,可接受程度低,流通范围较狭窄,故在汉字优选原则下,这些俗讹字形在后世被纷纷淘汰,成为汉字字库中的怪字或死字,后代人已不习见。今天人们阅读古籍时稍有疏忽,就会出错,这是值得注意的。当然,对碑刻文献文字而言,异体字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做到万能,解决所有碑刻文字的正确辨识问题。因此,对待这些特殊字形,我们更要细致分别异同,切忌望形定字,随意张冠李戴。勤查碑别字等工具书,考察、比对碑志文字相同、相近、相类用法,科学梳理字形发展演变脉络,紧密结合具体语境,找准字词关系,准确理解词义,疏通文义,是辨别石刻疑难字的基本要求和办法,由此便可很好地解决石刻文字释读问题,切实提高石刻文献整理质量。

参考文献:

- [1] 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西安马家沟唐太州司马闾识微夫妇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4(10): 25-48.
- [2] 毛远明.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8.
- [3] 赵 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 [4] 朱 亮, 何留根. 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5] 员志安. 中国北周珍贵文物[M].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

- [6]黄林纳.隋代蒋庆墓志考释[J].中原文物,2014(3):89-93.
- [7]王昶.金石萃编[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
- [8]秦公,刘大新.广碑别字[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 [9]章黼,撰.吴道长,重订.重订直音篇[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0]李明,刘采运.唐窦希瓘神道碑研究[J].考古与文物,2014(5):95-101.
- [11]徐殿魁.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J].考古,1991(9):818-831.
- [12]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40.
- [13]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M].北京:中华书局,2005:561.
- [14]齐心.北京元代史迹图志[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73-174.
- [15]慧琳.一切经音义[M].日本狮谷白莲社翻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952.
- [16]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7]毛远明,何山.“兗”的俗变考查[J].中国语文,2010(6):557-560.

To Make Textual Criticisms and Explanations for Popular form of Character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New Epitaphs

He Shan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anguage documents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unearthed epitaph materials are true, extensive content, abundant, h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and literature value. Accurate textual research and explanation, scientific arrangement is key of the effective use epitaph material; the difficulty lies in the correct words vulgar changeable which is not easy to distinguish, the inscription is not easy broken incomplete fuzzy knowledge, language and elegant deep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Textual inscriptions difficult words need to discover the secular change reason, combing the deformation context,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characters, analysis of configurational basis, coherence the law of variation, the use of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method. To make textual criticisms and explanations for popular form of character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new epitaphs can provide help for using and studying the literature of new epitaphs, and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tone vulgar Character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new epitaphs; popular form of characters; textual research;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

(责任编辑 王 作)